

21世纪高等学校新闻传播系列教材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 新闻论著选读

焦国章 刘 赞 等编著

21SHIJI GAODENG XUEXIAO XINWEN CHUANBO XILIE JIAOCAI

河北人民出版社

21世纪高等学校新闻传播系列教材

21世纪高等学校新闻传播系列教材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 新闻论著选读

焦国章 刘 赞 编著
李 敏 王 艳 闫 爽

21SHIJI GAODENG XUEXIAO XINWEN CHUANBO XILIE JIAOCAI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论著选读/焦国章, 刘赞等编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2

ISBN 7 - 202 - 03624 - X

I. 马... II. ①焦... ②刘... III. 马列著作—新闻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A5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3317 号

丛 书 名	21 世纪高等学校新闻传播系列教材
书 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论著选读
作 者	焦国章 刘 赞 等编著

责任编辑	赵锁学 李向锋 甄 洁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72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3000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 - 202 - 03624 - X/G · 891
定 价	21.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篇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节选)(1842年12月~1843年1月)	(1)
第二篇	马克思：M致R(1843年9月)	(14)
第三篇	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1845年3月)	(21)
第四篇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月)	(25)
第五篇	马克思：一八四七年给费尔特海姆的信(1847年9月)	(33)
第六篇	马克思：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1848年7月)	(37)
第七篇	马克思 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 (1849年12月)	(47)
第八篇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1857年3月)	(51)
第九篇	马克思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 等人(通告信)(1879年9月)	(56)
第十篇	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谣的(1882年10月)	(71)
第十一篇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84年2月~3月)	(76)
第十二篇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6月)	(88)
第十三篇	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1890年9月)	(93)
第十四篇	列宁：《火星报》编辑部声明(1900年8月)	(100)
第十五篇	列宁：从何着手?(1901年5月)	(109)
第十六篇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1月)	(118)
第十七篇	列宁：致《真理报》编辑部(1912年10月)	(127)
第十八篇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节选) (1918年3月)	(132)
第十九篇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918年9月)	(144)
第二十篇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	(149)
第二十一篇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4月)	(168)

第二十二篇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1920年7月）	（173）
第二十三篇	列宁：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草稿）（1920年11月）	（180）
第二十四篇	列宁：关于“出版自由”（1921年8月）	（185）
第二十五篇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	（192）
第二十六篇	斯大林：编辑部的话（1901年9月）	（203）
第二十七篇	斯大林：我们的目的（1912年4月）	（211）
第二十八篇	斯大林：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1923年5月）	（214）
第二十九篇	斯大林：论工人通讯员（1924年6月）	（219）
第三十篇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1928年6月）	（223）
参考书目		（231）
后 记		（233）

第 一 篇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1]（节选）

（1842年12月～1843年1月）

“莱比锡总汇报”在全普鲁士境内的查封

科伦12月31日。德国的报刊在看来是阴暗的预兆下进入新的一年。“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在普鲁士国家各省被封这一事实，足以打破轻信者对行将来临的巨大让步所抱的各种扬扬自得的幻想。在萨克森书报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是由于讨论普鲁士的问题被迫停刊的，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再想不受检查地讨论我们的内部问题了。这个结论是从事实中得出来的，谁也不会否认它。

加在“莱比锡总汇报”头上的主要罪状大约如下：

“该报只报道一些传闻，后来发现这些传闻至少有一半是捏造的。此外，该报不满足于断定事实，而且还要追根究底。尽管该报的见解有时是错误的，但它总是十分自以为是地而且往往带着恶毒的激情来发表这些见解。轻浮、‘不谦逊’、‘幼稚’乃是该报全部行为的特色；一言以蔽之，该报行为不端。”

假定所有这些罪状都是有根有据的，那末，试问这些罪状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的任性呢，或是用来反对方兴未艾的、年轻的人民报刊的必然性呢？问题是关于仅仅某一类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

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报刊，在其存在的初期都表现出德国报刊的那些特征，而每一种报刊也都受到德国报刊曾经受到的那些指摘。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它体现出那种本来意义上的“独特的”方针，这种方针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报刊的敌人也是很喜爱的。

最近不断向年轻“报刊”发出的种种责难是相互排斥的。他们说道，请看看吧，英国和法国的报刊所执行的方针多么坚定、彻底和明确。这些报刊在生活中有着牢固的支柱，它们的观点就是现存的、完全成熟了的、社会势力的观点。它们并不强迫人民去接受任何学说，它们自己便是人民及其党派的真正学说。而你们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你们只是捏造这些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它们塞给人民。你们创造政党的精神，而不是这种精神创造了你们。可见，他们忽而责备报刊没有政党，忽而又责备报刊想弥补这种缺陷创立政党的愿望。显然，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大声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也就没有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自觉了的人民精神的政治思想那样成熟、定形和周密。首先，刚刚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可靠性不像对这事件的道德实质（事件通过道德实质来表现自己的行动）那样关心。这是事实或是杜撰，——而事件却始终始终是人民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具体表现，是真实的叙述。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所以，纵令年轻的报刊每天都在戕害自己，纵令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才知道自己的情况。人民知道，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饮料。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担当了各种罪过，并准备为它和它的荣誉忍受一切屈辱；它的报刊正在抛弃傲慢的外表以及自满和武断，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精神的玫瑰花。

所以，我们应该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看做是针对年轻的人民报刊，因而也就是针对真正的报刊的责难。十分明显，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刊。我们应当把对人民报刊的指摘看做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虽然如此，我们在本文的开头还是把对于德国报刊的预兆只描绘成看来是阴暗的预兆。事情也正是这样，因为反对任何一种现象的斗争都是这一现象得到认可和这一现象的现实性与力量的最初形式。所以只有斗争才能使政府和人民（甚至报刊自己）相信报刊具有真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只有斗争才能表明，报刊的存在究竟是一种让步或是必要，是幻觉或是真实。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科伦日报”

科伦1月3日。“科伦日报”在12月31日发表了一篇注有“莱比锡27日”字样的通讯，这篇通讯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声调报道了“莱比锡总汇报”被封的

消息。可是在昨天这里收到的“国家报”上，封闭这家报纸的内阁法令的日期却是12月28日。只要确定“莱比锡总汇报”被封的消息是12月31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这一事实，就能解开这个谜。显然，“科伦日报”认为不但可以捏造通讯，而且还可以捏造通讯记者，并且用自己的声音冒充光荣的莱比锡市的声音。“科伦日报”的“唯利是图的”幻想“巧妙地”混淆了概念。这种幻想把“科伦日报”报馆搬到莱比锡去了，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已不可能设在科伦。如果“科伦日报”编辑部在比较冷静的考虑之后，还妄图用自己的幻想把戏来冒充冷酷的真事实情，那末我们就不得不再报道一件与这篇神秘的莱比锡通讯有关的事实了，这件事实

“完全越出了礼貌的界限，甚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中庸而慎重的人都认为太不谦逊了”。

至于说到“莱比锡总汇报”被封这件事，我们已发表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承认“莱比锡总汇报”被指摘的所有那些缺点并不是纯粹捏造的。但我们认为这是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因此，如果人们打算容许发展本身，那就应该像容许发展中的毛病那样容许这些缺点。

“莱比锡总汇报”并不是整个德国人民报刊，但它是这种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起初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实。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完全会体现出真正的伦理精神，就像每一片蔷薇花瓣都表现了蔷薇的特质并散发出蔷薇的芬芳一样。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

“科伦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塞尔日报”的论争

科伦1月11日

“艾拉斯特，我看到您的目光充满了烦恼。

是不是由于我的来到？

您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会见时您沉重地叹息？

您是为什么而忧郁呢？”^[2]

这些话主要是对我们“科伦的邻居”说的！“科伦日报”不愿多谈它“臆想出来的告密书”，它避而不谈这个**主要问题**，而一味埋怨人家以极不愉快的方式把“编辑部”拖进了这场论争。但是，亲爱的邻居，既然“科伦日报”的记者可以把我们的一篇柏林通讯同“莱茵报”混为一谈，那末为什么不许“莱茵报”把“科伦日报”的作为回答的莱茵通讯同该报本身混为一谈呢？现在来谈谈关于**事实**的问题。

“它（“莱茵报”）（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不是控告我们的**什么事实**，而只是控告我们的**意图**！”

我们不仅控告“科伦日报”的意图，而且还控告表现了这一意图的**具体事实**。这个具体事实，即“科伦日报”企图发表海尔维格的信^[3]这件事，由于**外部的偶然性**而变成了意图，虽然在这之前它的意图已经成为事实了。任何被阻挠而未能实现的事始终只是意图，但难道因此就可以不对这事实负法律上的责任吗？打算在那些阻碍自己的行动实现，使行动不能变成行动而只能变成意图的偶然性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辩护的理由，这无论如何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德。但是我们的忠顺的邻居不向“莱茵报”发问——邻居对它的印象不好，认为它很快就能找到答案，而且不会由于考虑是否“正直和诚恳”而“惶惑不安”，——而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应该怎样来评价这张报纸的猜疑的（说得正确些是反对猜疑的自卫）（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那一部分为数不多的公众”发问。“科伦日报”问道：“莱茵报”从哪儿知道“我们除了这个意图（即想登载海尔维格的信的意图）（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就没有另外的意图，（signo haud probato [无法证明的]）（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即我们还要给该信作者的幼稚而狂妄的行为以应有的斥责呢？”可是，“科伦日报”又从哪里知道“莱比锡总汇报”公布海尔维格的信的**意图**是什么呢？例如，为什么它不能够是由于想抢先报道一个新消息的天真愿望或者只是想把这封信交给社会舆论去评判的诚恳想法而这样做呢？可敬的邻居，请允许我们向您讲一件有趣的事情。罗马曾禁止印刷可兰经。然而一个狡猾的意大利人却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出版了一本**驳斥**可兰经的书，封面标名为“驳可兰经”，而里面却纯粹是可兰经的翻版。难道这种诡计不是一切异教徒都用过的吗？尽管瓦尼尼在自己的宣布无神论的“世界剧场”^[4]一书里竭力地对各种各样反对无神论的论据加以雄辩的发挥，难道他不是仍被烧死了吗？难道伏尔泰不是在自己的“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一书中宣传无信仰，而在注解里却又维护宗教吗？有谁相信这些注解的赎罪的力量呢？

我们可敬的邻居最后说：然而，

“即使我们有这种意图，难道就可以把我们想发表这封本来就已为大家所知道的信的企图与最早公布这封信的行动相提并论吗？”

但是，最亲爱的邻居，其实“莱比锡总汇报”所公布的也只是已经流传着许多副本的信而已。“的确，少爷，您太吹毛求疵了。”^[5]

在1832年8月15日即圣母升天节里，教皇 ex cathedra（直译是：从宝座[彼得的]上发下的通令，即应当成为整个教会的确定不移的真理的通令——编者注）通令说：

“凡人皆有信仰自由之权利，此实属荒谬（deliramentum）之论；而出版自由则为首恶。”

这一警示之言把我们从科伦带往科布伦茨，带到“中庸”报纸，即“莱茵—摩塞尔日报”那里。看了这一段引言之后，这张报纸反对我们维护出版自由的号叫就完全可以理解而丝毫不足为奇了，但是，这样一来，该报自命为“报刊的最热情的朋友”的声明就更显得奇怪了。今天从该报“中庸”栏里跳出的固然不是两头狮子，然而却是一张狮皮和一件狮子的袈裟。我们将从自然史方面对它们加以必要的注意。第1号的作者顺便告诉我们说：

“它（‘莱茵报’）（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是在这样诚恳的方式下来进行斗争的：它一开始就向我们保证说，如果‘莱茵—摩塞尔日报’一旦被封，它也会为了它所珍贵的‘合法的地位’而提出抗议。如果我们那位为一切被压迫报刊的自由而斗争的骑士不是接着就突然粗野地辱骂在我国早已真正被封的、众所共知的‘慕尼黑政治纪事’，那末这种保证就使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和欣慰。”

妙不可言的是，“莱茵—摩塞尔日报”一面严格地裁判其他报纸事实转载上的撒谎，同时自己却在叙述事实中公开撒谎。这里所提的在文章里是这样说的：“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举出来：它在汉诺威事件^[6]中的所作所为，它那反对天主教的偏颇论争（hinc illae lacrimae! [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令人感兴趣的是，可敬的报纸是不是认为‘慕尼黑政治纪事’^[7]的仅只方向相反的类似行为是罪大恶极呢？”在有关“慕尼黑政治纪事”的引文里只是谈到它曾进行反对新教的“偏颇论争”。但是，难道我们是用这一点来为它的查封辩护吗？既然我们在“慕尼黑政治纪事”上看到“仅只方向相反的”“类似行为”，而我们在谈到“莱比锡总汇报”时曾说这种行为根本不能成为查封的理由，那末我们又怎能认为这种查封是正当的呢？恰恰相反！我们曾向“莱茵—摩塞尔日报”的良心呼吁并曾问过它，同一种行为某些人采取时它认为应该禁止，

而另一些人采取时就不加禁止，能够这样做吗？我们曾问过它，那末，他认为不可饶恕的是某种行为本身呢或者只是这种行为的方向？“莱茵—摩塞尔日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它回答说，它不像我们那样责难一切偏颇的宗教论争，它只责难**那种胆敢维护新教的偏颇论争**。既然我们在反对“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被封这件事时可以和“莱茵—摩塞尔日报”一起提到“莱比锡总汇报”反对天主教的偏颇论争，那末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不和“莱茵—摩塞尔日报”一起而单独提到“早已被封的”“慕尼黑政治纪事”的偏颇论争吗？因此，第1号殷勤地给那些我们想用来说明报纸**事实转载**上的撒谎的理由又加上了一条新的理由。我们所列举的理由是：“国家的公众性不强”，公开的、不成熟的、“日常政治思想的不完善”，“现代历史形成过程”的特征；而第1号又加上了一条：大部分德国报刊实际上的**愚蠢浅陋**。“莱茵—摩塞尔日报”以自己本身的例子证明了**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伪造**不真实**的事实，因此也就会产生歪曲和撒谎。

现在，我们来谈谈2号（狮子的袈裟），因为，被第2号加以充分发挥的第1号的种种论据，在这里引起了极端的混乱。狮子的袈裟首先向公众吐露了它那令人不感兴趣的心情。它期待我们“大发雷霆”。然而，我们仅仅“顺便说了几句看来是**慎重的反驳话**”。但是，在它对这种“意外的宽恕”的谢意中，却渗进了一层令人懊恼的疑惑：

“意外的宽恕实际上是心情温和的结果，或者是精神不快和倦怠的结果。”

我们并不打算向我们虔诚的敌人解释，**牧师的愉快**有时可能真的是**精神不愉快**的原因，我们却希望谈谈“我们感兴趣的反对意见的内容”。这位虔诚的先生说道：他“可惜不能隐瞒如下的事实”，即根据他那“最温和的见解”看来，“莱茵报”“只是企图用空洞的辩论来掩饰狼狈混乱”。而且为了任何时刻都不致使“**伪善的顺从或谦逊**”露出原形，虔诚的先生在这里企图用最使人信服的、最无法反驳的论据来确证他自己“最温和的”见解。他写道：

“当然，不能否认“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它那反对天主教的偏颇论争，它那谎言谰语等等”，但是，我们这位伟大哲学家黑格尔的高材生认为，**这些过错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其他的报纸也犯了同样的过错（正像任何一个骗子手把他那许许多多仍然逍遥法外的同伙们的欺詐行为作为在法庭上的有力辩词一样）。”

我们在什么地方说过“‘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其他的报纸也犯了同样的过错”？我们在什么地方总是**企图**为这些过去的罪过“辩护”呢？我们的真正意思（不应该把这个意思和它在“最温和的见解”的镜子里的反映混为一谈）是这样的：首先“莱茵—摩塞尔日报”——列举了“莱比

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因此，我们才为这些罪过开了一张清单，之后，我们又接着说：“如果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都互相责难彼此过去的罪过，那末，诉讼就会围绕着表面问题兜圈子：罪过是由于自己的行动呢，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行动？我们准备承认，和‘莱比锡总汇报’比起来，‘莱茵—摩塞尔日报’这位殷勤的主妇是无辜的，她不仅在生活中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而且根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生活特征。”

因此我们并不是说“还有别的报纸”，而是说“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并且我们肯定地把“莱茵—摩塞尔日报”也归入其中。我们并不是说，它们可以互相援例，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充分的根据，相反地，我们是说它们有权利利用同样的话互相责难。“莱茵—摩塞尔日报”只能以它的罪过在于没有行动这种可疑的优越性自夸，因此，它可以用自己的有罪的没有行动来和“莱比锡总汇报”的有罪的行动对抗。我们用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可以向“莱茵—摩塞尔日报”说明它的消极的罪行。现在，“莱茵—摩塞尔日报”却向寿终正寝的“莱比锡总汇报”大发雷霆，然而当“莱比锡总汇报”在世的时候，“莱茵—摩塞尔日报”不但不去驳斥它，反而去抄袭它。“最温和的见解”企图使自己更易了解我们的意思所用的那一比喻，需要加以小小的、但是极重要的修正。它不该只提起一个骗子，这个骗子把其他逍遥法外的骗子的勾当作为在法庭上的辩词。它应该提两个骗子，一个没有改过而逍遥法外，另一个虽已改过但仍被关在监牢里；而前一个骗子却战胜了后一个。

“此外”，“最温和的见解”接着说道，“此外‘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和宗教信仰而有所变更’；可见，甚至毫无价值的报纸也正因为它是无价值的而具有了这种无价值的生存权利（就如同地球上的一切其他无价值的存在物一样，正由于它们的无价值的存在，它们的生存权利是不可能否认的）。”

虽然，虔诚的先生想要使我们相信，他不仅没有拜过任何“伟大的”哲人为师，甚至也没有拜过任何“渺小的”哲人为师。

这段话经我们的朋友莫名其妙地一叙述就带有这样的讽刺和诙谐的意味，而原来这段话（在它透过“最温和的见解”的棱镜折射出来之前）是这样说的：

“但是使我们遭到责难的文章并不是谈‘莱比锡总汇报’往日的品质，而是谈它现在的品质；虽然用不着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封……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摩塞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和宗教信仰而有所变更。相反地，既然报刊的生存权利要取决于它的思想方式，它的非法地位已是毫无疑问的了。而直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一部法典、一所法庭是为思想方式而存在的。”

可见，我们说的仅仅是：任何人不可能由于自己的道德品质、自己的政治和宗教信仰而被监禁或被剥夺财产或别的**法律权利**。看来，上面的说法特别使我们这位充满宗教情绪的朋友惶惑不安。我们为一切无价值的存在物要求不可侵犯的**合法地位**，并不是因为它无价值，而是因为它的缺陷始终是它**思想方式的缺陷**，而对这种思想方式来说，既不存在**法庭**、也不存在**法典**。可见，我们是把**恶劣的思想方式**（对于它并不存在**法庭**）和**恶劣的行为**（如果它们是**违法的**，对于它们是存在着**法庭和刑法的**）对立起来的。可见，我们是说，即使是无价值的存在物，尽管它无价值，也有生存的权利，只要这种权利是不**违法的**。我们并不像我们虚假的回声所转述的那样，说“无价值的存在物”正“因为它是无价值的”，因而它的“生存权利是不可能否认的”。相反地，我们可敬的慈善家应该相信，我们反对的是他以及“莱茵—摩塞尔日报”成为坏存在物的权利，所以，我们在竭力使它们变成好的，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有权根据这一点侵害“莱茵—摩塞尔日报”及其保镖的“**合法的地位**”。现在再来检验一下我们这位虔诚的拥护人的“见解尺度”：

“但是，如果‘政治思想’的报纸居然肯定说：像‘莱比锡总汇报’（首先，当然是“莱茵报”自己）这样的报纸‘相反地，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正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赞扬**’，因为，即使它们激起**不满和愤慨**，它们激起的也仍然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那末我们却不能不对这种奇怪的‘对德国祖国的功绩’表示怀疑。”

所举的这段话在原文中是这样说的：“相反地，那些强使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全部炽热的兴趣和戏剧性的紧张情绪（这一切都随着每个**形成过程**、首先是**现代历史的形成过程**而出现）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不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正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赞扬**吗？甚至就假定这些报纸激起了不满和愤慨吧！但要知道，它们激起的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要知道，它们终归使背弃了国家的人心又转向国家了，尽管在初期回转的人心是激动的，愤懑的！它们不仅激起了不满和愤慨……首先，它们唤起人们热烈地**关切国家**，使国家同它的公民**亲密相联**、**休戚相关**等等。”

可见，这位最值得尊敬的先生把**中间环节**省略了。事情就像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他：“老友，你应该感谢我们，我们启发了你的理性，即便我们带给你一些悲伤，但你的理性还是会胜利的。”而我们的朋友就会回答道：“说得好！我应该感谢你们给我带来了悲伤吗？”在对“最温和的见解”做了这一切的检验之后，用不着特别深入的心理探讨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位作家（他早已有一种错觉，好像

我们这群志同道合的人所组成的许多科霍尔斯（科霍尔斯是古罗马的一种步兵大队，由 300 人到 600 人组成。——译者注）“正带着火佩着剑踏遍整个德国”的无边幻想了。最后，我们的朋友抛弃了假面具。“**乌尔利希·冯·胡登及其战友**”（大家知道，其中也包括**路德**）将会原谅“莱茵—摩塞尔日报”上**狮子袈裟**的无力愤怒。把我们和这样的大人物相提并论，这种抬举只能使我们羞愧。但为了以盛情报盛情，我们要把我们的朋友和**主任牧师哥采**相提并论，并以**莱辛**的话作为赠言：

“这就是我的侠义的简短回答。写吧，牧师先生，也鼓舞别人写吧，随便你写多少都行。我也要动笔写。如果我放过你的即使是一点小错误而不加反对，那就是说，我已无力再挥动笔杆了。”^[8]

.....

卡·马克思写于 1842 年 12 月 31 日，1843 年 1 月 3、5、7、9、11 和 15 日

载于 1843 年 1 月 1、4、6、8、10、13 和 16 日“莱茵报”第 1、4、6、8、10、13 和 16 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186～209 页，人民出版社，1956。

注 释

[1]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37 年创刊。19 世纪 40 年代初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报纸。1842 年 12 月 28 日内阁下令在普鲁士境内查封该报，而该报在萨克森的出版则到 1843 年 4 月 1 日为止。

[2] “艾拉斯特，……您是为什么而忧郁呢？”一段：出自莫里哀的戏剧《讨厌的人》第一幕第五场。

[3] 海尔维格的信：指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诗人格·海尔维格由于普鲁士政府禁止他筹办的激进杂志“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而写给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信。“莱比锡总汇报”在 1842 年 12 月 24 日公布了海尔维格的信，之后，内阁就颁布了封闭该报的法令，而海尔维格也被逐出普鲁士。

[4] “世界剧场”：指的是留契里奥·瓦尼尼的《永恒神意的圆剧场》一书，该书在 1615 年用拉丁文出版。

[5] “的确，少爷，您太吹毛求疵了。”：出自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一场。

[6] 汉诺威事件：指 1837 年汉诺威国王废除宪法所引起的事件。这一专横的行为引起了哥丁根大学七位自由派教授（格里姆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韦伯）的抗议，结果七位教授被撤职，其中有人被放逐。汉诺威事件在整个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莱比锡总汇报》曾为哥丁根大学教授辩护。

[7] “慕尼黑政治纪事”：《慕尼黑政治纪事》是《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纪事》的简称。这个杂志是教

权派的杂志，自1838年在慕尼黑出版。19世纪40年代，该杂志曾反对在普鲁士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新教，为天主教会辩护。

[8] “这就是我的侠义的简短回答。……我已无力再挥动笔杆了。”：是莱辛《箴言》中的一段话。

写作背景

19世纪40年代初，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德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斗争逐渐高涨。当时的德国新闻界正处于封建专制的高压之下，被马克思称为德国报刊的“晚刊阶段”、“精神上的大斋期”，惨淡经营的报刊也只是德国社会“沼泽地上的磷火”。关于普鲁士的出版状况和争取出版自由的论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重要矛盾，并且日益尖锐。封建统治者企图维护长期以来控制报刊的旧制度，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力图建立自由出版报刊的新制度。

1840年春新上台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查禁了一批资产阶级进步报刊后，为了笼络人心，缓和矛盾，在报刊出版问题上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让步。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政府根据新国王的诏书颁布了新书报检查令。新法令假惺惺地宣布“立即取消出版物所受到的违背陛下意志的、不适当的限制”，这一举措居然蒙蔽了许多人的耳目，博得了包括封建王朝御用报刊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报刊在内的一片赞扬之声。而实际上，这一法令不仅保存了反动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更加强化了这种检查。马克思在当时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敏感和对事物的深刻洞察力，看穿了这个新书报检查令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不仅不作人云亦云的赞赏，而且给予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

果然，在新书报检查令颁布没多久，伪善狡猾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就逐渐撕下了要让书报出版有较多自由的假面具。从1842年下半年起，普鲁士当局开始不断地下毒手镇压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书籍和报刊出版活动。一些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进步书籍、报刊相继被查禁。1842年12月28日，萨克森王国出版的资产阶级进步报纸《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这家报纸执行民主方针，因为对反动的普鲁士当局镇压民主运动进行如实的报道、为人民的合理要求进行辩护而被扣上了“捏造”、“轻浮”、“行为不端”的罪名。政府查封《莱比锡总汇报》这一决定，彻底撕去了政府“自由主义”的伪装，引起了德国举办民主报刊的报刊工作者普遍不满和愤慨，也擦亮了报刊工作者的眼睛，迫使他们思考报刊生存的条件。马克思指出查封这一事实不仅打破了轻信者对行将来临的巨大让步所抱的种种洋洋自得的幻想，而且充分表明了政府“反对方兴未艾的、年轻的人民报刊的必然性”。

1842年12月31日至1843年1月15日间，马克思针对普鲁士政府查封《莱比锡总汇报》这一事件，连续撰写了7篇评论文章，共约2万字，发表于1843年1月1日~16日间的7期《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上。在这组通讯中，马克思不仅积极为《莱比锡总汇报》进行辩护，用事实戳穿了新书报检查令的骗局，还在文中阐述了马克思新闻思想中有关“人民报刊”的许多重要观点。

内 容 简 介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原文达2万多字，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引录原文全文。现在节选的是其中的三小节。

文中马克思为被反动当局查封的资产阶级进步报纸《莱比锡总汇报》进行了辩护，用大量的事实戳穿了普鲁士政府新书报检查令的骗局。但是本文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较早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新闻思想中“人民报刊”这一重要观点。

马克思指出：人民报刊生活在人民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表达人民的心声，因此它是真正的报刊。德国的人民报刊还很年轻，难免犯一些不成熟的错误，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人民报刊的发展过程——只要报刊的本质是纯洁和真实的。文中还重点论述了报刊真实性的问题，指出人民报刊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要真实表达社会舆论，“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人民报刊具有自己产生和发展的独立个性，各个分子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发展，才能把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必须承认报刊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并尊重这种规律，发挥人民报刊的社会使命，孜孜不倦地揭露敌人，并成为“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在阐述这些思想的同时，马克思还穿插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的“中庸”报纸，谴责了反动报刊无耻捏造的伎俩。

一、只有人民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

马克思认为，人民报刊“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人民报刊总是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忠实反映现实生活，并表达人民的所思所想，为人民鼓与呼，而不是回避群众中出现的斗争和问题。因此，它着重报道本国的事件，把人民的目光由国外引向国内，集中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把人民同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马克思指出，“报纸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报刊应该是人民的喉舌，是人民群众有声的表达者，既表达出人民精神和他们的日常政治思想，也公开表露出人民及其政党的真正学说。因此，我们说只有人民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尽管人民报刊

也会犯一些错误，这是因为“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形势比较复杂时作者可能会在判断方面出现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并不是出于私利，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一旦发现了这些错误，人民报刊“自己就会推翻”。这是人民报刊和维护封建统治报刊的区别之一：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是否可以捏造事实。真正的人民报刊尽管会犯错，但绝不会捏造事实。从这个角度看，因讨论普鲁士问题而被迫停刊的资产阶级进步报纸《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看做是针对年轻的人民报刊，因而也就是对真正报刊的责难”。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报纸还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能够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报纸都是人民报刊，即真正的报刊。

二、人民报刊存在的基础是真实性

马克思极为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他把真实与否作为衡量“真正的报刊”的标志之一。人民报刊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要真实表达社会舆论，而不是歪曲社会舆论。马克思强调“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他不但主张报刊要“真实的叙述”，而且主张“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每一个新闻记者都要“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要把“从生活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人民相信的只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要采取辩证的眼光看待新闻真实性问题。人民报刊的确存在缺点，“我们承认《莱比锡总汇报》被指摘的所有那些缺点并不是纯粹捏造的。但这是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缺点”。报刊的真实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人们打算容许发展本身，那就应该像容许发展中的毛病那样容许这些缺点”。

三、人民报刊具有自己产生和发展的独立个性

这种独立个性也就是人民报刊的历史个性，它赋予人民报刊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使人民报刊的“伟大天赋特权”得以实现，从而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人民报刊的历史个性决定了它采取独特的方针，规定了它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还划定了它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方式。马克思指出：“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起初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只有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发展，人